

拉克教授本書體大思精，博識闕通，讀之令人心折。拉克批評當代西方的通史著作，謂此類著作於論道歐洲所受自東方的影響時，多不能適當表達此種影響的重要，亦不知分別歐洲對於東方高級文化所生的反應與對於其他海外原始文化所生的反應之不同。反之，拉克認為，當代西方治亞洲史的學者，多數又唯知孳孳於所研究的區域的語文，以求能應用各該區域的史料，其結果卻忽略了西方的語文，從而也忽略了西方所自有的史料。凡此見於西方史學的缺憾，本書當可兼補其不足。本書首卷已近千頁，洋洋數十萬言，於內容敘事上自不能全無瑕疵，惟微末細節，無關鴻旨，不足道矣。

王德昭

*China and the West*. By Wolfgang Frank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7. 165pp. Selected Bibliography and index. U.S. \$ 5.95)

中國和西方交往問題的研究，除早期有張星烺、向達等人作有系統的介紹外，近來對這方面有特殊貢獻的，當推方豪先生了。外國人談論這問題時，大都以歐洲人作本位，但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此書，在其序言已清楚說明是 *China and the West*，而非 *The West and China*，可見作者雖是歐洲人，然確想用另一眼光來看這問題。

本書共分七章：

- I. China and the West before the 13th Century;
- II. The First Direct Link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
- III. The First Direct Contact by Sea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 IV. The First Intellectual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 V. The Colonial Invasion of China;
- VI. China's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West;
- VII.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第一章作者以極簡單的敘述，說出十三世紀前的中外關係，並指出據漢書的記載，公元九十七年中國有一使節跨中亞直達波斯灣（頁四）。作者並將漢書中有關上述的資料，翻譯如下：

He reached T'iao-chih (probably on the east coast of the Persian Gulf) and passed through An-hsi (the Persian part of Parthia) to the shore of the Western Sea, from where Ta Ch'in could be seen.

按此所述顯係後漢和帝永元九年西域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之事。後漢書西域傳論：「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應即上引作者的譯文之所自來。作者以此事的出處歸之於前漢書，當係一時誤記。

傅書又云：除大秦外，Li-kan 的名字也已出現(頁四)。如傅教授此處所舉的Li-kan 仍係據後漢書西域傳「大秦一名犁鞞」而言，則漢書西域傳已有「西與犁鞞條支接」之語，據馮承鈞編西域地名，犁鞞、犁鞞，為一同一名稱，則可見Li-kan 一名在漢書早已出現了。

第二章敘述蒙古朝時中國和歐洲之接觸。傅吾康說在七、八世紀至十三世紀時中國和阿拉伯、波斯間交通已十分發達，但傅教授說未知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曾否將中國情形傳入歐洲(頁七)。有關阿拉伯對中國的記載，大約在公元九世紀中葉，阿拉伯地理學家 Ibn Khordâdbeh 所著的道程及郡國志 (*Le livre des routes et des provinces*) 一書，對當時中國沿海各商業大城市的位置的記載，已大體可以考見，間亦敘述風土物產(註一)。傅教授並言當時在泉州和揚州，已有波斯人及阿拉伯人所設立之工場及貿易機構。傅教授這點是絕對正確的。然當時除泉州和揚州外，最重要的地區應為廣州。當時爲了應付大量湧入沿海各商業重鎮的阿拉伯人及波斯人，故有市舶司之設立，繼而有蕃坊之設立，並有種種條例限制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在華的活動。這在中外關係史來說，是一件極重要的事(註二)。接着，傅教授又提出十三世紀天主教來華之重要教士，如 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 William of Rubruk 和同時著名旅行家馬可孛羅 (Marco Polo) 在華的活動也有詳細記述。有關 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 及 William of Rubruk 的事蹟，近年有英文專書出版，對這段研究當有更進一步的貢獻(註三)。其實天主教及景教自唐

註一：Ibn Khordâdbeh 一書，於 1865 由 Barbier de Meynard 譯成法文，載於是年 *Journal Asiatique*。

註二：參閱桑原鷺藏著，楊鍊譯唐宋貿易港研究第一章市舶司及市舶頁一至十七，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商務版。

註三：參閱 *The Texts and Versions of John de Piano Carpini and William de Rubruquis*. Edited by C. Raymond Beazley, 1903,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是書於 1966 年由紐約 Kraus Reprint Corp. 翻印。又 1900 年，Wm. Woodville Rockhill 也編譯 *The Journeys of William de Rubruquis and John de Piano Carpini to Tartary in the 13th Century*，也由 Hakluyt Society 出版。

貞觀九年(即公元六三五年)教徒阿羅本抵達中國後，即展開活動(註四)。公元一二八七年，景教徒Bar Sauma從蒙古出發抵達羅馬。Bar Sauma爲一在北京出生之景教徒，且被認爲第一個抵達歐洲之中國人(註五)。Bar Sauma抵羅馬後，再往熱那亞(Genoa)、巴黎等地。在他的日記中，他並述說在巴黎朝見菲臘四世和在葛可尼(Gascony)朝見英王愛德華一世的情形。在較早時期，即公元一二二一年，長春真人邱處機西遊記等書，在中外關係史上都很有價值，惜都未給傳教授列入，否則讀者對這段的了解，當有一更明確的概念。

第三章述說中國和歐洲海上交通之首次直接發生關係。在此章之首，傳教授即述說明初之海上活動，這當是指鄭和而言。傳教授說一四三三年(明宣德八年)後的中止下西洋，一如其首次下西洋般的突然。但應該指出，一四三三年後之中止下西洋，是與宣德二年安南決定棄守有關係的。明自安南棄守後，外交即採保守政策，故中止下西洋之舉是必然的。但如傳教授指出，中國人一向希望外人「來化」(頁廿四)，如此，則所謂中止下西洋當可以此政策來解嘲，而不用再解釋因安南問題而改變對外政策了。在本章傳教授分析中國人對外人的觀念和一貫的政策，是十分中肯和具有信服力的(頁廿二至廿七)，這點可見傳教授對中國傳統上有一些問題，確有獨到的認識。然而，傳教授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沿海各大城市所居住的地方，爲中國政府特別劃分的，而且給予自治的權利，這在中國人眼中並非給予外人的特權，而是具有蔑視的成份，因爲中國人以爲蠻夷(barbarian)是難以了解中國的文明，所以他們(指蠻夷)只有過着他們原始(primitive)和野蠻(barbarian)的生活」(頁卅一)。對於傳教授這點，筆者是難以同意的。唐宋時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廣州、泉州等地，政府給予特別地區作爲他們居停之所，並非如傳教授所說是含有蔑視的成份。事實上，唐、宋期間，外人在華是極受歡迎和優待的。中國政府之所以劃分特別區域予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居住，一方面固然是爲了便利他們能够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可防止他們在華進行不法行爲，但當時中國政府

註四：參閱 F. S. Drake, "Nestorian Monasterie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it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Nestorian Tablet", *Monumenta Serica*, Volume II, No. 2, 1937; 又 F. S. Drake,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I. Nestorian Christianity", *St. John's Review*, Volume XXI, No. 7, 1954, Hong Kong.

註五：參閱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 Book II, Chicago, 1965, p. 39.

對他們是處處照顧，並無加以蔑視。唐大詔令集卷十頁六十四太和三年疾愈德音條云：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於殊俗；況朕方寶勤儉，豈愛遐琛？深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行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從唐大詔令集這段記載，可見當時皇帝對蕃客的重視。不但皇帝對蕃商、蕃客非常重視，地方官也採取同樣的政策。他如留華蕃人可以應中國的科舉，晉身士林，中國政府並為設蕃學以教育蕃人子弟；可以與華人通婚和雜居。凡此在桑原隲藏的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一書中論之詳矣。所以中國雖一早已有內中國，外夷狄之對外政策，然這不過是一種理論而已。事實上，中國一向不排斥外人，且一向是只重人才，不重種族的。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下回鶻傳下記載唐武宗命李德裕選秦漢以來外人入仕中國而功績顯著者三十人，作異域歸忠傳。這是皇帝對外人之重視，又一明證。

唐末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五記唐宣宗（公元八四七至八六〇）、懿宗（公元八六〇至八七三）時崔慎猷論時事曰：

「近日中書，盡是蕃人。」

上面所舉史實，當可確證唐、宋時中國政府對阿剌伯及波斯人，絕無歧視或偏見。

第四章述說第一次中國和西方的知識交往。此章述說當時天主教教士利瑪竇等在華的活動，並述說當時名士李贄對利氏的看法。利氏當時為了爭取國人對天主教的信仰，乃「蓄髮稱儒」，以期能爭取更多士大夫的信心。利氏傳教的政策是頗成功的，可惜後來的傳教士，終因拜祖、尊孔等問題而弄得極不愉快（註六）。然而，天主教教士在這段時期對中國科學的貢獻，有極大的成就，這點傳教授在本章中有很清楚的說明。傳教授在本章也提到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時，耶穌會會士替清政府擔任翻譯一事（頁四七）。然而，在這事情的過程中，為了在起草條約時中國官員倚靠教士的翻譯，使中國後來吃了大虧，而俄國人則佔盡便宜。這當又是中西關係史上另一不健全的一頁（註七）。

註六：事詳陳受頤耶穌會士的儒教觀及其反應，國學季刊五卷二期，一九三五年，頁一至三十一。或朱謙之耶穌會對於宋儒理學之反響，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學專刊三卷一期。

註七：參閱 Liu Hsün-min, 劉選民，“A Discrepancy in the texts of the Treaty of Nerchinsk”，壽羅香林教授論文集，一九七〇年，香港。

在天主教教士紛紛來華聲中，英國也想和中國交好。在一五八三至一五九六年，英國伊利沙伯女王一世先後修函明神宗，希望通好。惜傅教授沒有提到這點（註八）。

第五、六章可說是全書的精華。第五章述說殖民勢力對中國的伸展。第六章則述說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反應。在這兩章中，雖然傅教授全以西方人眼光來分析當時的問題，然而所得的結論是非常中肯的。傅教授且提出在一八四三年英商渣甸洋行一艘開往廈門的商船，內中不但載有來華傳教的傳教士，且有走私來華的鴉片（頁七七）。這確是極大的諷刺。

一八七〇年的天津教案至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更使中國陷入痛苦的深淵。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且狂言聯軍目的為衛護「文明」而戰（頁八二）。傅教授說這正代表宗教和政治當時是多麼的密切。「聯軍」入京後，如所周知，姦、淫、搶、殺，無所不為。這就是德皇所說的「文明」，難怪當時虔誠的天主教徒英欽之對劫後的北京，發出無限的感慨（註九）。

在西方武力和宗教勢力下，也就產生了許多買辦和洋奴（頁八六）。當時外人在華的種種不法行爲，傅教授毫不留情的指出（頁八七至九一）。這點是非常可貴的。

在敘說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反應，傅教授有系統地列舉當時對西方有特別見解的人士，如魏源、林則徐等。並提到由謝清高口述，楊炳南撰作的海錄。接着，傅教授又提出馮桂芬對自強的看法，及反變法人物倭仁的主張。在這過程，傅教授都有極精細的分析。然而，這只不過是當時中國在西方壓力下一些小反應而已，同時可說只是個人的行動。當時對西方挑戰的反應，最重要的應推派遣幼童赴美留學之舉。這事的重要角色，為中國第一個留美畢業生容闈（註一〇）。從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先後有四批留學生，在容闈策劃下，經香港往美國就學。中國出名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也是這時期派遣赴美的人物（註一一）。惜這點未為傅教授所提到。

註八：參閱 Hakluyt, R.,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English Nation*, Glasgow, 1903-5, Volume V, pp. 451-452, Volume XI, pp. 417-420.

註九：參閱方豪清末維新政論家何啓與胡禮垣，新時代，一九六三年第三卷第十二期，頁廿至廿五。

註一〇：關於容闈，請參閱他的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1909,或西學東漸記，1934年，上海商務版。又可參閱羅香林著容闈與中國新文化之啓發，載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五五年，頁三六七至四一七。

註一一：有關留學生問題，可參閱 La Farque, T. E., *China's First Hundred*,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Press, 1942.

有關五四運動，政治方面，傅教授已有極清楚的闡明。在這時期，西洋文學對中國社會有着極大的影響力。易卜生（Ibsen）的作品給中國婦女界帶來無限的生命力，其他的所謂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賽先生（Mr. Science），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無窮的真理和災害。五四以後的中國，為傅教授寫來栩栩如生，給人帶來無限的遐思和感慨。

第七章述說十九及二十世紀之中國和西方，傅教授說這時期歐洲人對中國的觀點有其獨特的見地（頁一四〇）。在敘述西方人對中國的研究時（頁一四四至一四五），傅教授極正確地指出，直至最近，西方人對中國研究，大多集中於語言（Philology），而少涉及有關文化的方面，這點當是西方人為了方便對華擴張而如此做法。目前西方人對中國研究，和從前比較，當有不同之處，然而他們學習中文，目的只望能利用中國文獻而已（able to make use of Chinese sources historically），他們對中國人的思想、意見，是盡量不予以重視的。換句話說，他們只希望利用中國人的史料來研究中國，而不利用中國人的研究成果，過去十多年的中國（頁一四九），絕不想主動去瞭解西方，也不主動要求西方承認中國為世界強國之一。然而，中國經過整整半個世紀的不安，加上過去廿年來種種變幻，中國是否已逐步治愈了她的創傷，抑或正一步一步地步向死亡，這是一般人——尤其是那些所謂 China-Watchers ——所感覺興趣的。

本書雖從德文翻譯成英文，（譯者為 T. S. Wilson）但文字方面仍然流暢易懂。書末附加之中國朝代編年及中西交往重要年表，對一般讀者來說，極為方便，至於參考書目，更能幫助讀者對這問題作進一步的追索。總而言之，本書雖有些微缺點，然這也只是觀點和見解的不同而已。同時，本書內容是從古代到現代，傅教授已盡量做到合乎讀者，特別是西方讀者的要求，已是一件絕不容易的事。筆者認為，在有關中外關係書籍中，傅教授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

趙令揚

*Die Entwicklungspolitik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949 bis 1962: unter Besonderer Beruecksichtigung der Technologischen Grundlage.* By Dr. U. E. Simoni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8. pp. 179. US\$ 5.00.)

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間，筆者在西德佛萊堡大學（Freiburg University）時，德友席慕尼博士（U. E. Simonis）對中國問題發生濃厚興趣，當時他已大學畢業，以專員